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ISSN 2096-0484, CN 10-1334/D

##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作者：张晓磊  
DOI：10.19780/j.cnki.ytaq.2023.3.5  
收稿日期：2023-02-27  
网络首发日期：2023-05-11  
引用格式：张晓磊.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J/OL].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https://doi.org/10.19780/j.cnki.ytaq.2023.3.5>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张晓磊

**内容提要：**海权国和陆权国的海洋军事战略一直处于演化进程之中，区域拒止、制海、战力投射等战略手段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态势。扩大兵力投射范围、加强进攻性打击能力成为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演进方向。战后特别是冷战末期到2018年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之前，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总体上聚焦于区域拒止和制海两个维度。2022年12月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向增强战力投射维度扩展的方向基本明确。“反击能力”作为新变量将加快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朝着区域拒止、制海与战力投射三位一体的融合方向发展，还将推动日本加速拓展多元化海洋军事战术体系，并以应对台海突发事态作为日本发展海上进攻性打击能力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扩张性倾向，将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健康发展形成多重冲击。

**关键词：**日本海洋军事战略 反击能力 安保三文件 中日安全关系 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简介：**张晓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后安倍时代日本政治与政局变动研究”（编号：2021RBSB01）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3.3.5

**文章编号：**2096-0484（2023）03-0072-18

近年来，美西方对华认知出现重大偏差。2022年下半年，美日相继在本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作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sup>①</sup>美国对中国肆意抹黑、极限施压，并裹挟其他国家对华实施围堵遏制，在海洋军事战略上不断拉拢同盟加大对华威慑。日本对中日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战略焦虑感和危机感日益凸显，谋求加大对华威慑性对冲。2022年12月底岸田政府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sup>②</sup>，其在海洋军事战略上的主体性明显上升，尤其是其涉华指向凸显。日本通过打“台湾牌”“以台制华”等行径，意图发展进攻型军力，将给

<sup>①</su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http://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2023-04-19]。

<sup>②</sup> 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参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2023-04-19]。

中日安全关系带来多重冲击。

## 一、海洋军事战略的模式与新变量

长期以来，海洋军事战略研究总体上存在着二元论倾向，即海权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和陆权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的海洋军事战略模式，前者通常是攻势战略，而后者则基本表现为守势战略；从学术史来看，表现为马汉与科贝特两位学者的海洋军事战略思想的对立。但随着传统的陆权和海权国家间界限日益模糊，两种模式的海洋军事战略也愈加交融。

近年来，学界开始出现将两种模式融合研究的趋势，比如日本海洋战略研究学界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模式，基于不同战略目标和战力投射范围，将海洋军事战略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区域拒止（area denial）、制海（sea control）和战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参见表 1）。所谓区域拒止，通常是传统陆权国家的海洋军事战略，主要目标是在从本国海岸线起算 1000—2000 公里范围内的陆海空域建立防御屏障，以防止或限制外敌的军事威胁，达到近海防卫的目的；<sup>①</sup>所谓制海，通常是传统海权国家的海洋军事战略，指在外海或远海区域获得军事优势，以阻止敌方的优势地位，实现航行自由，标志着制海权的获得；所谓战力投射，也通常是传统海权国家的海洋军事战略，它意味着强烈的战略扩展和攻势，以进攻性姿态封锁敌方近海，达到反区域拒止的目的。三种海洋军事战略层层递进，在各国的具体战略实践中，这三种战略并不完全独立，会呈现出多种组合的混合姿态，推动海洋军事战略研究朝着融合方向发展。

表 1 海洋军事战略的目标和战力投射范围

类 型	战略目标	战力投射范围
区域拒止	近海防卫	陆地、沿岸→海洋
制 海	遏制敌方，航行自由	海洋→海洋
战力投射	敌方近海，反区域拒止（反击能力）	海洋→陆地、沿岸

资料来源：後瀨桂太郎『海洋戰略論』、勁草書房、2019 年、12 頁。

除了以上的综合性模式，近年来日美学界还开始基于海上尤其是太平洋海域范围内安全态势的变化，集中探讨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在大国竞争时代的强化问题，并对日本海权的新内涵进行讨论。大部分研究的对华指向性明确，较多观点认为日本需要通过强化海洋军事战略以对冲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实力的急速上升，从而维系日美同盟海上军事战略的威慑实效。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认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

<sup>①</sup> 後瀨桂太郎『海洋戰略論』、勁草書房、2019 年、3 頁。

海军在舰队规模、总吨位和火力等关键实力指标上超过了日本，这可能会加剧日中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可能会基于海上实力优势，在对日局部海上冲突中采取进攻战略。如果不加以解决，中日海军力量不平衡将给美日同盟带来压力，并破坏亚洲的稳定。吉原敦促美日政府认识到中国的挑战，迅速采取行动，恢复海军平衡。<sup>①</sup>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认为，日本应该从实力和认知两个层面加强对华海上军力的评估，要看到海上自卫队目前对于中国在作战海空域的导弹侦察、打击复合体的应对能力很弱。假设未来中美大国竞争加剧，包含第一岛链的整个西太平洋海域都将是日美与中国的作战区域，针对中国未来兵力投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日本需要强化包括进攻性打击能力在内的海洋军事战略。<sup>②</sup>

2022年12月底，日本政府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并在其中引入了“反击能力”这一概念。所谓“反击能力”，是指对日本发动武力攻击、其手段是通过弹道导弹等实施攻击的情况下，根据武力行使三要件，作为防御此种攻击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自卫措施，通过灵活运用防区外防卫能力等，进而具有可在对方领域进行有效反击的能力。<sup>③</sup>

从前述日本政府对“反击能力”的定性可见，要使自身具备防区外防卫能力，以达到在对方领域进行有效反击的战略目的，现有军事战略手段中，最常规的有效方法便是配备长射程防区外导弹，也就是远程进攻性打击力量。基于此，日本在2022年《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中提出了要在2027年之前具备陆基<sup>④</sup>和海基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并在2033年之前具备空基<sup>⑤</sup>防区外导弹以及超高音速导弹等其他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为填补2027年之前的战略空窗期，日本还决定一次性购买美国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sup>⑥</sup>由此可见，日本首先将“反击能力”融入其海洋军事战略中。<sup>⑦</sup>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反击能力”的提出，对外释放出其海洋军事战略即将发生质变的强烈信号，这意味着冷战后日本要主动打破在海洋军事战略上的战略守势，走向

---

① Dragon Against the Sun: Chinese Views of Japanese Seapower, May 19, 2020, Toshi Yoshihara, <https://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dragon-against-the-sun-chinese-views-of-japanese-seapower>, [2023-04-19].

② 武居智久「海上防衛強化せよ」、「正論」2020年9月号、101頁。

③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2023-04-19].

④ 主要通过日本12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的改进达到防区外反击的目的，2021年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短时间无法形成防区外战斗力。

⑤ 这并非指此前日本确定引进的F35A搭载的JSM联合打击导弹，因为它的射程较短，在500公里左右，防区外战斗力偏弱。

⑥ 参见《改变想法 日本拟一次性完成美国“战斧”购买计划》，新华网，2023年2月15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2/15/c\\_1211728941.htm](http://www.news.cn/world/2023-02/15/c_1211728941.htm) [2023-02-30].

⑦ 「国家防衛戦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2023-04-19].

海洋军事战略扩张的道路。<sup>①</sup>

尽管“反击能力”只是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中的一个概念，但它对日本却具有极重要的核心战略意义，无论从学术视角还是战略实践层面，研究这一问题都具有重大价值。从学理层面看，站在“反击能力”视角重新审视日本的海洋军事战略变迁史，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对战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变化规律的认知，从而更有利于看清未来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走向。从实践层面看，面对当前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随着日本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日本未来发展进入关键的十字路口。特别是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其整体海洋战略走向关系到亚太安全格局乃至全球安全形势演进，而海洋军事战略的走向则是其海洋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日本前外务省高官、内阁官房参与宫家邦彦 2023 年伊始撰文提出日本应该确立“新海洋国家”的构想，建议在“印太”地区构筑新的“岛国同盟”（不同于此前的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凸显日本政策界的战略焦虑态度<sup>②</sup>

因此，尽快定位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和政策价值。“反击能力”作为日本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概念和政策理念，成为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又一重要变量，并将对作为海权国家的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演变产生一系列深层次影响。

基于以上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发展动向，笔者将结合日本政府新进引入的“反击能力”概念这一新变量，按照“反击能力”一反区域拒止一战力投射这样的逻辑进路，在梳理战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变迁过程中，对当前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变化新方向进行分析，同时评估其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 二、战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变迁

战后特别是冷战末期到 2018 年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之前，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总体上聚焦于区域拒止和制海两个方向。<sup>③</sup>但从 2018 年出台新

<sup>①</sup> 回顾日本出台三个新安保文件的过程可知，日本用“反击能力”的概念代替了此前日本执政党意图确立并引起巨大争议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一概念。从学理上来看，“反击能力”的概念似乎从字面意义上解决了此前“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易被等同于“进攻性打击”这一公然违背国际法基本公理的最大争议点，用“反击”的字眼突出了此项能力的自卫性质。但即便将“反击能力”作为一种自卫措施，那么这种措施本身是否超出自卫界限，进而达到进攻性打击的程度，在日本国内政策界以及国际法学界也是存在巨大争议的。笔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专文涉及此问题。中国国内有关日本“反击能力”问题的研究成果，参见栗硕：《日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构建进程分析》，《日本学刊》2022 年第 2 期；邱静：《日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讨论新动向》，《日本学刊》2022 年第 2 期。

<sup>②</sup> 宫家邦彦『「シン・海洋国家日本」構想への転換を』、『Voice』2023 年 1 月号、January 2023。

<sup>③</sup> 从国内文献来看，专门研究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成果并不多见，以“日本”和“海洋军事战略”为篇名或关键词搜索的成果为 0，以“日本”和“海洋战略”为篇名搜索的成果有 66 篇文献，以两词为关键词搜索的成果有 9 篇文献，以“日本”和“海洋安全战略”为篇名搜索的成果为 8 篇文献，以“日本”和“军事战



的《防卫计划大纲》之后，日本开始在上述两个方向之外向实现战力投射的战略方向做出尝试性扩展。从2022年12月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以及确定拥有“反击能力”之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向增强战力投射扩展的方向基本明确。

“反击能力”的出现，标志着战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走向的分水岭，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和时代印记。

### （一）战后至2018年：聚焦区域拒止和制海战略

战后7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总体上处于战略守势的状态，主要聚焦于构筑区域拒止和一定的制海能力，当然在如此大跨度的时间里，在不同阶段聚焦的具体海洋军事战略各有侧重。根据国际军事史的变迁以及日美军事同盟的演变，我们可以将此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

1. 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的海洋军事防卫主要依靠与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即在日美同盟机制内进行“专守防卫”，缺少明确的海洋军事战略指向

这一阶段防卫政策的主要依据是1957年5月内阁决议确定的《国防基本方针》和1976年10月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其中，《国防基本方针》指出，日本将“根据国力和国情，在自卫所需限度内，逐步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对于外来入侵，依靠与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予以阻止，直至将来联合国有能力制止这种侵略”。1976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则放弃了过去以周边国家军事力量为参照标准、建设能充分应对未来威胁的防卫力量的旧有思路，而代之以“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在这一构想中，日本独立应对的侵略规模，从以前的“实质有限侵略”降为“小规模有限侵略”。<sup>①</sup>总的来看，这一阶段日本海洋防卫力量的建设并未体现出“量”的增长，海洋军事战略指向也是模糊的，这与当时缓和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

---

略”为篇名搜索的56篇文献中只有1篇专门涉及日本海洋军事战略（陆海英：《日本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海洋战略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国内文献集中于从日本海洋战略或海洋安全战略的整体或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较少从中观甚至微观层面对日本的海洋战略或海洋安全战略进行剖析，较少涉及专门研究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如果考虑到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以及自卫队的国内法律地位，学者多使用“防卫战略”一词指代日本的军事战略，那么用“日本”和“防卫战略”为篇名搜索得到的48篇文献中，涉及海洋领域防卫战略的也不多见，只有杨鲁慧、陈祥军的《后冷战时期日本海权防卫战略的转型及对对中国的影响》（《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8期）。专著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学者多从宏观视野对日本的海洋战略展开研究，比如康德瑰、金永明的《日本海洋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修斌的《日本海洋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国外文献也存在相似问题，比如德国学者乔尔根·舒尔茨等的《亚洲海洋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世界平和研究所编《希望の日米同盟—アジア太平洋の海洋安全保障》（中央公論新社，2016年）。近些年专门论及海洋军事战略的日本学者的文献包括：後瀨桂太郎《海洋戦略論》、勁草書房、2019年；武居智久「海洋新時代における海上自衛隊」、『波濤』通巻第199号、2008年11月；後瀨桂太郎「海上自衛隊の戦略の方向性とそとの課題」、『海幹校戦略研究』特別号（通巻第199号）、2016年11月。

<sup>①</sup> 神谷万丈、武田康裕编著：《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99—300页。

## 2. 冷战末期：重点强化对苏联的区域拒止和周边海域制海能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苏之间出现“新冷战”的紧张局面。针对冷战末期苏联的“海洋要塞战略”，美海军加强了在远东区域以航母战斗群为中心的战力投射和军事据点战略。鉴于日本海在地理位置上与苏联毗邻，加之冷战末期指挥通信网络、长距离轰炸机、长射程导弹的快速发展，日本已经处于苏联的区域拒止范围。在此阶段，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海上防卫角色有所加强，其主要任务一方面是针对苏联的区域拒止强化自身的反区域拒止能力，在宗谷、津轻、对马海峡方向强化对苏水上舰艇和潜水艇的威慑和阻止能力，与此同时也因应和补充了美海军在此海域加强制海能力的战略需求，以达到保障海上航路安全的目的。<sup>①</sup>这个阶段的日本海洋军事战略以区域拒止为主，同时开始构筑周边海域的制海能力，以填补美海军的部分战略空间。从1986年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开始，日本海军逐步引进“宙斯盾”舰及反导系统以加强海上防空能力，引进P-3C预警机以提高广域反潜作战能力，这些都是强化制海能力的具体体现。<sup>②</sup>此阶段并无对战力投射的战略指向。

## 3. 1990—2009年：重点构筑完整制海能力

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美国确立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在海洋领域也获得了压倒性优势。作为同盟国的日本在海洋军事战略目标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除了继续巩固周边海域的防卫，把战略重心放在如何从军事领域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以配合本国的外交战略。当时还仅担任海上自卫队幕僚监部防卫部长的武居智久认为，冷战的终结使得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军力、军事同盟等概念需要重新定义，海上自卫队的战略目标也需要转变。<sup>③</sup>这一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活动区域遍布全球，为反恐战争提供后勤支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投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搜救和救灾任务，积极参加国际冲突的解决，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客观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实际上在扩大活动区域、参加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任务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完整制海能力的构筑，达到了至少在局部区域应对高烈度战争的海洋军事战力。

## 4. 2010—2018年：重点强化对华区域拒止能力及周边海域的制海能力

2010年之后，随着GDP被中国反超，日本对华战略焦虑感急剧增加，认为在海洋军事战略上中国不但进一步巩固周边海域区域拒止能力，且通过建造航母、导弹驱逐舰、大型登陆艇等方式强化以南海为中心海域的制海及战力投射能力。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一阶段的国际战略环境又回到了冷战末期的状态，日本需要作出针对性的回应，以确保日本周边海域的海上优势（maritime

<sup>①</sup> 後瀧桂太郎『海洋戦略論』、勁草書房、2019年、127頁。

<sup>②</sup> 防衛庁編『昭和61年版防衛白書』、1986年8月、114—115頁；防衛庁編『昭和62年版防衛白書』、1987年、136頁；防衛庁編『昭和63年版防衛白書』、1988年9月、123頁。

<sup>③</sup> 武居智久「海洋新時代における海上自衛隊」、『波濤』通巻第199号、2008年11月、3頁。

superiority)，即便达不到上述目的，至少也要让对手无法形成海上优势，即所谓的海洋拒止（maritime denial）战略。<sup>①</sup>因此，在此阶段，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指向又重新回归到了第二阶段强化周边海域的区域拒止和制海能力，但战略博弈对手变成了中国。比如，从加强区域拒止能力方面看，就将潜艇配备定额从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的16艘提高到2013年版大纲的22艘；从强化制海能力方面看，2010年之后，日本水上舰艇数量出现明显回升态势，护卫舰定额从2010年版大纲的48艘增加到2013年版大纲的54艘等。<sup>②</sup>

## （二）2018—2022年：酝酿战略攻势，初步发展进攻型军力

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除了提出继续加强日本周边海域的区域拒止和制海能力，比如致力于通过配备F35B可垂直起降战斗机来强化直升机航母战力等<sup>③</sup>之外，还首次提出“为应对周边国家不断提升的军力，应具备在入侵部队威慑圈以外阻止其侵入的能力”，这是日本在对外释放要增加战力投射战略的强烈信号，同时也为具备反击能力进行前期政策储备。为此，2018年版《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計画》首次提出，应为实现上述能力做好推进配备长射程防区外导弹（包括远程反舰导弹LRASM、空基反舰导弹JSM以及联合空面防区外导弹JASSM）的准备。<sup>④</sup>

在2022年12月新版“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前，日本的防区外导弹配备进程大致如下：一是引入短程（500—1000公里）防区外导弹，即日本F35A战斗机未来将会携带JSM联合打击导弹作为基本配备；<sup>⑤</sup>二是推进开发岛屿防御用的超音速导弹；三是通过2020年12月的内阁决议，加速推进以在陆基、海基、空基等各平台层面应用为前提的日本12式地对舰导弹长射程技术的研发进度。<sup>⑥</sup>2021年7月，日本防卫省与三菱重工签订对12式导弹进行改进的技术开发合同。<sup>⑦</sup>从上述进程来看，在此阶段，日本在战力投射层面处于从无到有的战略

① 後潟桂太郎「海上自衛隊の戦略の方向性とその課題」、『海幹校戦略研究』特別号（通巻第199号）、2016年11月、25—26頁。

② 「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国家安全保障会議及び閣議決定）、平成25年12月10日。

③ 「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国家安全保障会議及び閣議決定）、平成30年12月18日。

④ 『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31年度—35年度）について』、8頁。我が国への侵攻を試みる艦艇や上陸部隊等に対して、自衛隊員の安全を確保しつつ、侵攻を効果的に阻止するため、相手方の脅威圏の外から対処可能な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JSM、JASSM及びLRASM）の整備を進めるほか、島嶼しょ防衛用高速滑空弾、新たな島嶼しょ防衛用対艦誘導弾及び極超音速誘導弾の研究開発を推進するとともに、軍事技術の進展等に適切に対応できるよう、関連する技術の総合的な研究開発を含め、迅速かつ柔軟に強化する。

⑤ 『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249頁。

⑥ 「新たなミサイル防衛システムの整備等及び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の強化について」、令和2年12月18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決定、閣議決定。

⑦ 『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440頁。国産のミサイル開発の最前線三菱重工株式会社航空機・飛昇体事業部飛昇体技術部 陸・海上システム設計課 課長 服部起也、2021年7月、12SSMを大幅に長射程化する



储备状态，这实际上也是日本在为随后宣布拥有“反击能力”做最后的准备。

“反击能力”在政策演进上进入实操阶段后，基本上以如何发展列装长射程导弹等进攻性武器为政策出发点，从政策指向上来看具有明显的战略进攻属性。2017年3月自民党提出建议书之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逐步进入政策实操酝酿阶段。2020年6月，日本政府宣布“宙斯盾”舰反导系统暂停部署决定，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正式围绕政策实操展开。8月4日，自民党在政策建议书中提出日方应该探讨拥有能够阻止对手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以提高战略威慑力。<sup>①</sup>10月23日，自民党国防议员联盟在政策建议书中提出关于扩大对敌基地攻击范围等具体的实操建议。12月18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发展防区外防卫能力的内阁决议，将发展长射程导弹列入日本的武器装备部署计划。<sup>②</sup>

2021年12月6日，首相岸田文雄在施政演说中提出：“日本政府为了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将对发展包括且不限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政策选项进行实际的讨论，以便在一年左右通过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sup>③</sup>2022年4月26日，自民党向岸田政府提出题为《关于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sup>④</sup>，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表述替换为拥有“反击能力”，并提出行使“反击能力”的目标范围不仅限于敌国导弹基地及指挥控制系统。

在自民党和内阁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同时，2022年1—7月日本政府就同样的问题进行了17次专家意见交流会，同年9月还设立了“综合考虑作为国力的防卫力量有识者会议”，并于11月22日提出了“有识者会议报告书”。报告书提出：“随着印太地区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以及周边国家核武能力的迅速提高，特别是考虑到一些国家具备变轨和高超音速导弹的部署，为维持和提高日本的威慑能力，具备并增强反击能力变得不可或缺。”<sup>⑤</sup>可见，无论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还是“反击能力”，日本政府的政策指向一直是明确的，即为

---

12式地对艦誘導弾能力向上型の開発契約を防衛省より受注しました。

①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国防部会・安全保障調査会「国民を守るための抑止力向上に関する提言」、2020年8月4日、<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0442.html> [2023-03-17]。

②「新たなミサイル防衛システムの整備等及び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の強化について」、令和2年12月18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決定、閣議決定、<https://www.kantei.go.jp/jp/content/000075220.pdf> [2023-03-17]。

③「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2023-03-17]。

④「新たな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等の策定に向けた提言—より深刻化する国際情勢下におけるわが国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の防衛力の抜本的強化の実現に向けて—」、2022年4月26日、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安全保障調査会、<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3401.html> [2023-3-17]。

⑤「国力としての防衛力を総合的に考える有識者会議」報告書、5頁、[https://www.cas.go.jp/jp/seisaku/boueiryoku\\_kaigi/index.html](https://www.cas.go.jp/jp/seisaku/boueiryoku_kaigi/index.html) [2023-03-17]。

列装进攻性武器的战略性目标服务。

### 三、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新动向

以 2022 年 12 月底出台的新版“安保三文件”为依托，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在总体方向、战略手段以及战略目标上均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的本质在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主体性、积极性和涉华性。

#### （一）确定加强战力投射和发展进攻性打击能力的战略攻势方向

在 2022 年 12 月底通过的新版“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明确宣布拥有“反击能力”，这意味着至少在军事战略层面，日本官方确定了增加战力投射的总体方向，未来的目标是形成在战力投射方向上的基本战斗力，至少应对低烈度的局部战争和冲突。具体来说，就是在 2027 年之前形成对防区外导弹的实际运用能力，2033 年之前获得更为先进的防区外导弹运用能力，同时确保必要充分的导弹数量。根据 2022 年《防卫力量整備计划》<sup>①</sup>，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后五年内花费 5 万亿日元用于引进中程弹道导弹系统。具体项目包括：实现国产“12 式陆基反舰导弹”改良型（陆基、海基和空基）量产化，延长射程至 1000 公里；改良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载 SSM 反舰导弹，延长射程至 1000 公里以上，并可用于航空自卫队飞机搭载；购买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另装备可搭载于潜艇的垂直导弹发射系统（VLS）、运输机搭载系统等。在部队编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组建承担行使“反击能力”任务的“防区外弹道导弹部队”，定位为陆上自卫队的基干部队，由地对舰弹道导弹连队（7 个）、岛屿防卫“超音速导弹”大队（2 个）、长射程导弹部队（2 个）构成。

“反击能力”概念在政策酝酿的过程中，逐步演变并最终替换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却保持了其中的扩张性基因。如前所述，在“反击能力”进入日本政府政策实操阶段之前，其前身“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一概念历经持续讨论。其实，早在 1956 年，时任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在国会答辩中便使用了“打击导弹等基地事宜”，与“对敌基地攻击”的表述基本具有相同内涵。进入 21 世纪，日本政府的国会答辩中依然沿用相似概念。例如，2005 年 5 月时任防卫厅长官在国会答辩中，针对反弹道导弹相关措施的规定，使用了“对敌基地攻击”的用法。<sup>②</sup>自民党从 2013 年到 2020 年的三次对政府建议书中也使用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类似用法。<sup>③</sup>2013 年建议书使用“策源地攻击能力”，2017

① 「防衛力整備計画について」、令和 4 年 12 月 16 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決定、閣議決定。

② 第 162 回国会 安全保障委員会 第 10 号（2005/05/12、43 期、自由民主党）大野防衛庁長官答弁、<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6203815X01020050512&spkNum=5> [2023-03-17]。

③ 「新『防衛計画の大綱』策定に係る提言（「防衛を取り戻す」）」、自由民主党、平成 25 年 6 月 4 日、[https://www.jimin.jp/policy/policy\\_topics/pdf/pdf106\\_2\\_1.pdf](https://www.jimin.jp/policy/policy_topics/pdf/pdf106_2_1.pdf) [2023-03-17]；2017 年 3 月の自民

年建议书使用“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尽管 2017 年建议书中出现了“反击能力”，但是与“对敌基地”捆绑使用，即反击目标仅限于敌国导弹基地。<sup>①</sup>2022 年 4 月 26 日，自民党对政府建议书开始完整使用“反击能力”概念。对 2017 年的概念微调，标志着自民党开始酝酿将这一概念推向实操。

2017 年 3 月自民党政策建议书之前，“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基本限于国会讨论、答辩环节，且日本政府的解释保持了一贯的立场：一方面，日本政府认为，从法理上来说，在国家存亡危机之时，为了排除敌国导弹基地对日方的侵害，日本有权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属于日方认定的自卫权的一种实施方式，本质上属于自卫的属性；另一方面，战后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下，日本不宜拥有给对方带来直接威胁的攻击性武器。<sup>②</sup>因此，总体上，日本政府一直认为日本并未具有能够实际打击对方基地的进攻性武器，也即并不具有现实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解释的“画外音”在于，日本在法理上拥有对敌基地攻击的权力，但囿于客观条件限制，在现实中并未具有对敌基地攻击的能力，这就为日本政府提出发展相应能力做了前期逻辑上的铺垫。

## （二）发展区域拒止、制海与战力投射三位一体的融合性战略手段

从前述变迁过程中可以发现，推动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演变有诸多变量，但其中三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一是日本在国家战略目标及国家利益诉求上的变化，二是战后日美同盟尤其是美国海军军事战略的变化，三是日本面临的外部特别是周边威胁因素的变化。冷战末期日本将苏联海军战略视为主要威胁，而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日本主要将中国军力的上升定位为其最大的外部和周边威胁。下面主要从中美日三国海洋军事战略的对比评估中分析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新动向，并进一步从军事技术发展、战术运用的进化等层面对日本海洋军事战术和策略的运用方向做出预测。

### 1. 深化对中美海上军力的双重对冲

---

党政務調査会「弾道ミサイル防衛の迅速かつ抜本的な強化に関する提言」、  
<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134586.html> [2023-03-17]；「国民を守るための抑止力向上に関する提言」、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令和 2 年 8 月 4 日、  
<https://news.yahoo.co.jp/byline/takahashikosuke/20200731-00191040> [2023-03-17]。

① 2017 年 3 月の自民党政務調査会「弾道ミサイル防衛の迅速かつ抜本的な強化に関する提言」、  
<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134586.html> [2023-03-17]。

② 鳩山一郎内閣総理大臣答弁（船田防衛庁長官代読）、船田防衛庁長官答弁、衆議院・内閣委員会議録第十五号、1—2 頁、1956 年 2 月 29 日、  
<https://kokkai.ndl.go.jp/simple/disppdf?minId=102404889X01519560229> [2023-3-17]；伊能国務大臣答弁、衆議院・内閣委員会議録第 21 号、1959 年 3 月 19 日、16 頁、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3104889X02119590319&current=8> [2023-03-17]；横畠内閣法制局長官答弁参議院・予算委員会議録第 20 号 13 頁、2015 年 8 月 24 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8915261X02020150824&current=1> [2023-03-17]。

从亚太海洋安全格局的变化来看,近年来美国在亚太的海洋军事战略倾向于将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推到前台,发展所谓的对华“主动拒止”战略。从现实主义的视野看,这是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其开始侧重自身在亚太的“离岸平衡者”角色,但采取的是“推卸责任”策略。这一策略也促使日本通过加强自身防卫以达到均势的战略目的。<sup>①</sup>可见,未来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确立新方向的推动力,一方面来自配合美国亚太海洋军事战略的新调整,另一方面则聚焦于与中国海洋军事战略的均势性对冲。

为了对冷战末期以来中美日三国海洋军事战略模式及战力的变化进行更为科学的对比,我们首先确定一个关于国家高烈度常规战争遂行能力的量化标准,然后结合前述海洋军事战略的三种模式以及演变阶段的划分,对中美日在各个阶段的海洋军事战略在三种模式上的战力等级进行对比,为分析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模式演变方向提供更为直观的参照系。<sup>②</sup>

**表 2 高烈度常规战争（或冲突）遂行能力量化标准**

5	遂行能力优秀,有足够能力在全球应对他国军事挑战
4	遂行能力高,有能力在与强国军事对抗中处于优势地位
3	有能力遂行局部高烈度战争,若与同盟国合作可遂行全局性高烈度战争
2	无遂行高烈度战争能力,仅有遂行低烈度战争水平
1	达不到遂行低烈度战争能力

在表 2 中我们确定了从 1—5 的五个分值的量化标准,然后参照中美日三国在不同阶段确定的海洋军事战略目标以及各自实际的海上兵力部署状况<sup>③</sup>,确定了以下中美日三国在不同阶段的量化分值对照表。

**表 3 中国海洋军事战略变迁及遂行能力量化表**

	1980—1992 年	1993—2009 年	2010—2017 年	2018—2022 年	2023 年-
区域拒止	2	3	3→4	4	4
制海	1	2	3	3	3→4
战力投射	1	1	2	2→3	2→3

**表 4 美国海洋军事战略变迁及遂行能力量化表**

<sup>①</sup> 参见张晓磊:《中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意义、现状及路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 年第 2 期。

<sup>②</sup> 此种量化标准及对比方法参考了日本学者的部分前期研究成果,即 2018 年之前的量化数值参考了日本学者的量化结果(参见:後潟桂太郎『海洋戰略論』、勁草書房、2019 年、190 頁),但从 2018 年之后的量化数值是作者对比 2018 年之后中美日的军力部署给出的量化数值,属于作者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sup>③</sup> 2018 年之后的中美日海上军力部署数据来源于日本 2019 年和 2021 年《防卫白皮书》。

	1980—1989 年	1990—2009 年	2010—2017 年	2018—2022 年	2023 年—
区域拒止	3	3	3	3	3
制海	4	5	5	4	4
战力投射	5	5	5	5	5

表 5-1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变迁及遂行能力量化表

	1980—1989 年	1990—2009 年	2010—2017 年	2018—2022 年	2023 年
区域拒止	3	3	3	3→4	3→4
制海	2→3	3	3	3→4	3→4
战力投射	1	1	1	1→2	1→2

表 5-2 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舰艇数量变迁表<sup>①</sup> (单位: 艘)

舰种	2014 年	2019 年	2022 年
护卫舰(制海)(含直升机航母、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	47	49	47
潜水艇(区域拒止)	18	19	22
大型输送舰艇(战力投射)	3	11	11

依据表 2, 对比表 3 至表 5 中美日海洋军事战略的量化表, 同时对照 2022 年美国和日本相继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的涉华与遏华的战略目标, 可以发现日本的海洋军事战略在区域拒止、制海和战力投射三个维度上都有同步提速发展的战略需求。<sup>②</sup>从区域拒止和制海两个维度来看, 日本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加强对华的区域拒止和制海能力的优势, 以及减缓美国在亚太海域面临的所谓制海权压力。而从战力投射维度来看, 日本的主要战略目标则是通过对华追赶战力投射能力, 强化对华的反区域拒止能力, 实现对华战略和战力均势平衡。从表 5 中的量化数值来看, 日本在提升三个维度战略能力的需求程度上是分层次的, 在区域拒止和制海能力上, 中日整体上处于同一阶段的提升过程之中(从 3→4 或已到达 4)。但从战力投射维度看, 中日并非处于同一阶段(日本在 1→2 的过程之中, 而中国处于 2→3 的阶段), 这将给日本带来极

①『令和元年版防衛白書』、資料 10、主要艦艇の就役数、<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9/html/ns010000.html> [2023-03-17]; 『令和 4 年版防衛白書』。

② 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3-03-17]。



大的紧张和焦虑感。<sup>①</sup>因此，相比于区域拒止和制海能力的提升，日本在提升战力投射能力上具有更加强烈的战略紧迫感。在日方看来，这是实现对华均势成败的关键，通过具备反击能力实现战力投射方向上的质变，是日本加速实现对华均势的最有效途径。

总之，以“反击能力”加速提升战力投射能力，弥补对华均势差距，实现在海洋军事战略上与区域拒止、制海两个维度的有机融合，是未来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总体方向。

## 2. 拓展多元化的海洋军事战术体系

如前所述，具备“反击能力”释放了日本在海洋军事战略上向战略攻势方向加速转换的信号，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随着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海洋军事战略的上述三个维度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进攻和防御界限也将越来越难以界定。在此背景下，日本将会以具备“反击能力”为政策基础，加速拓展多元化的海洋军事战术体系，并向着扩张性、攻击性的方向继续发展。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使海洋军事战术体系扩张性和攻击性更强。比如，一旦反潜作战从传统的近距离反潜战（anti-submarine warfare, ASW）向广域反潜战（theater ASW）转换，那么潜艇对于水面舰艇的奇袭攻击优势将会大大削弱，这将加速海洋军事战略进一步从区域拒止向战力投射方向兵力部署的转换。<sup>②</sup>再如，一旦激光武器系统（laser weapon system, LaWS）实现实战化，那么将对传统的反舰导弹等巡航导弹形成有力反制，也进一步有利于水面舰艇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同样将推动海洋军事战略更强的扩张性。<sup>③</sup>另外，还有像半导体激光武器（solid state lasers）、电磁炮（electromagnetic railgun）、高超音速导弹等这些更加超前的军事技术在未来投入实战，那么将进一步改变传统海洋军事作战模式和战术体系等“游戏规则”，进而反推海洋军事战略发生质变。<sup>④</sup>

## 3. 以应对台海突发事态作为发展海上进攻性打击能力的首要战略目标

日本调整海洋军事战略，其涉华指向进一步聚焦于台海方向，被认为是一个全新却极为现实的安全态势。在日美战略界和学界看来，钓鱼岛和台海已经成为一个联动密切的安全区域，中国在此区域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对日美形成了新的威胁，日美需要形成新的对华威慑军事策略。应对台海突发事态，成为

---

<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大型输送舰艇的配备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战力投射上是否具备了遂行高烈度战争的能力，而只是表示具备了战力投射的基础能力。实际上，在日方看来，中日之间在战力投射上的主要差距恰恰在于通过中导等长射程导弹压制对方的反区域拒止能力。这就解释了中日在大型输送舰艇上的数量并无差距的原因。

<sup>②</sup> 後瀧桂太郎『海洋戰略論』、勁草書房、2019年、210頁。

<sup>③</sup> US. Navy Warfare Development Command, Next: Advancing Electromagnetic Maneuver Warfare, Volume 3, Number 2. Summer/Fal 2015, pp. 12-15.

<sup>④</sup> Ronald O'Rourke, Navy Lasers, Railgun, and Hypervelocity Projectile: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August 14, 2017, p. 1.

日本发展海上进攻性打击能力的首要战略目标。

2021 年，为配合日美首脑会晤罕见强调台海和平重要性及推动“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政策讨论，日美战略界及学界开始频繁构筑和宣扬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逻辑，强调中国正在进行针对台湾的战争准备，在对台政策上异乎寻常的“高调积极”。<sup>①</sup>同年 4 月，前内阁官房副长官、同志社大学特别客座教授兼原信克发文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若台湾发生战事，中国可能采取行动夺取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作者注）”，同时宣称“仅靠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入侵台湾，日本的支持将至关重要”。<sup>②</sup>甚至有日本文献开始针对“台湾有事”进行日方如何应对的兵棋推演。<sup>③</sup>同年 12 月 1 日，前首相安倍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并妄称日本“无法容许发生台湾遭武力侵犯”。<sup>④</sup>

2022 年 4 月，自民党向岸田政府提出题为《关于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直言应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同年 5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英国期间公开宣称：“今日的乌克兰或是明日的东亚。日本必须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绝不容忍在印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出现凭借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也至关重要。”<sup>⑤</sup>此后日美也开始有学者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海安全形势进行比较，并分析所谓台湾对日美的“安全风险”<sup>⑥</sup>，更有文章就所谓“中国入侵台湾”的能力进行具体评估并分析未来统一的几种可能性<sup>⑦</sup>。2023 年初，日美双方均有智库再次围绕“台湾有事”进行兵棋推演。<sup>⑧</sup>

① 宫家邦彦『米中戦争「台湾危機」驚愕のシナリオ』、朝日新聞出版社、2021 年。

② 兼原信克『「台湾有事」が現実味を帯びる、中国の膨張を支えるもの』、2021 年 5 月 6 日、<https://diamond.jp/articles/-/269831>[2023-04-19]。

③ 『正論』編集部「日本はいかに抑止し対処すべきか」、『正論』2021 年 10 月号、43 頁。

④ 西本秀「『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 安倍元首相が台湾のシンボでオンライン講演」、2021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D15JMOPD1UHBI01K.html> [2023-4-19]。

⑤ 岸田首相「ウクライナは明日のアジア」と危機感対ロ追加制裁表明」、<https://jp.reuters.com/article/japan-kishida-idJPKCN2MR18A>[2023-04-19]。

⑥ 秋田浩之『「台湾消滅」招く現秩序の瓦解』、『Voice』2021（09）、69 頁；松田康博「台湾海峡の地殻変動座視するな」、『Voice』2021（01）、71 頁；ジョセフ・ナイ「米国が中台に効せる『二重の抑止』」2022（11）、43 頁。

⑦ 渡辺金三「中国の台湾侵攻能力見極めろ」、『正論』2023 年 2 月号、51 頁。

⑧ 「台湾有事なら日米優位も被害甚大 自衛隊 144 機失う恐れ中国は軍事制圧に失敗 民間シンクタンクが相次ぎ机上演習」、CSIS、2023 年 1 月 9 日；「台湾有事なら日米優位も被害甚大 自衛隊 144 機失う恐れ 中国は軍事制圧に失敗 民間シンクタンクが相次ぎ机上演習」、『日本経済新聞』朝刊 2023 年 2 月 23 日；小谷哲男「台湾海峡有事シミュレーション：概要と評価」、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研究レポート、2023 年 3 月 30 日、<https://www.jiia.or.jp/research-report/security-fy2022-04.html> [2023-04-17]。

## 四、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扩张性倾向，将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健康发展形成多重冲击。用“反击能力”替代“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其实质发生了变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语境下，日本行使攻击的目标仅限于敌国的导弹发射基地，但“反击能力”语境下是不存在这种限制的。在自民党的建议书中，试图通过部分列举的方式体现日本行使“反击能力”所针对目标的广泛性，到了新版“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后，可以发现日本政府用了“必要最小限度”“施加有效反击”等抽象的表述对反击目标做了进一步模糊化处理，只要在发动攻击的敌国区域内且能实施有效反击，就可能成为日本行使“反击能力”的目标。可见，日本内阁与自民党之间就对“反击能力”行使目标的解释达成了一种共识或默契，以便在日后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为日方行使“反击能力”创造最大的解释和自由裁量空间。

但是，无论日本政府如何对“反击能力”进行辞藻的包装和掩饰，即便为了所谓自卫而对敌国基地的反击，也极易陷入进攻性攻击的风险，扩大可能的局部冲突，造成不可逆的危险后果。

综合来看，宣布拥有和增强“反击能力”，本质上是日本政府以制造新概念的方式进行政策宣示，对其自卫权做出过度扩大化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反击能力”的宣示是日本政府继2014年通过内阁决议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后，再次以同一方式继续扩大自卫权行使的范围、对象和适用条件，是对日本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再一次架空和剥离。

### （一）加剧中日海洋战略冲突，使两国海上安全关系走向更加复杂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中日海上战略关系的影响变量，主要包括中日海上实力对比、双方意图及亚太安全格局的变化。<sup>①</sup>此前，中国海上实力的日益增强，一度成为影响中日海上安全关系的最主要变量。但随着日本具备“反击能力”并首先融入其海洋军事战略之中，中日双方在海上实力对比、意图等多方面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日海上安全关系的演进更具有不确定性。

#### 1. “反击能力”的出台与日本对华威胁认知关联密切

如前所述，2022年4月自民党政策建议书显示日本执政党的外部威胁认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这是日方提出“反击能力”的重要认知基础。建议书提出提出以“威胁对抗型的防卫战略”作为焦点展开对日本防卫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并寻求在五年之内将防卫费占GDP之比提高到2%以上。外部威胁认知的聚焦推动日本安全战略的指向性趋强，进而推动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加大威胁对冲，这

<sup>①</sup> 参见张晓磊：《中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意义、现状及路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

是日方提出具备和增强“反击能力”的逻辑链条。

2. 日本在中导部署的战略目标、战术部署、战法体系方面的对华博弈属性极强

日方总体部署目标是在 5—10 年内形成陆基、海基、空基三位一体、500—2000 公里范围内的中导打击战力。在 2027 年之前具备陆基和海基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并在 2033 年之前具备空基防区外导弹以及超高音速导弹等其他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2027 年之前,为填补在日本本土研发的陆基和海基中导武器投入部署之前的战略空窗期,日本决定一次性购买美国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约 400 枚左右,以应对中国目前阶段的中导以及准中导。<sup>①</sup>由此可见,日方的平衡对冲心理极其强烈。

3. 扩张性海洋军事战略牵引日本海洋安全战略

2023 年 4 月,岸田内阁通过了日本《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综合性海洋安全保障在计划中的比重继续加大。日本政府在计划中写入普及自动无人潜航器,并将其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sup>②</sup>另外,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事属性将会继续加强。2022 年 12 月关于加强海上安保能力的内阁会议上,强调了加强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合作。在日本《国家防卫战略》中,也写入了“防卫省和自卫队要与海上保安厅紧密合作,以保障国家的海洋安全”。

实际上,近几年来,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的合作一直没有停歇。2021 年 12 月,在伊豆大岛以东海域,日本实施了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和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参加的实操性训练,被认为是针对领海警备的不测事态的综合性训练。2022 年 10 月 19 日开始,海上保安厅将大型无人机“海洋卫士”投入使用,其以青森县的海上自卫队八户基地为据点,进一步强化日本的整体海洋监视能力(MDA)。同年 11 月,根据《自卫队法》第 80 条的规定,日本出台了在实施应对武力攻击事态的共同训练时,防卫大臣如何临时指挥海上保安厅的实际操作细则。<sup>③</sup>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角色是互换、重合或者交叉的,海上保安厅已经实质上纳入了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总体框架之中。日本政府 2023 年 4 月 28 日敲定了《统制要领》,规定突发事态时防卫相根据《自卫队法》将海上保安厅纳入指挥的步骤。<sup>④</sup>

## (二) 压缩中日海上安全合作的战略空间

具备“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将更加聚焦传统安全领域,这

<sup>①</sup> 根据以下日方官方公开资料整理而成:「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2023-04-21];『令和 4 年版 防衛白書』。

<sup>②</sup> 古谷健太郎「中国海警船と対峙の 10 年海上保安庁と自衛隊との連携強化の必要性」、2023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furuya\\_08.html](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furuya_08.html) [2023-04-21]。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参见《日政府敲定突发事态时防卫相指挥海保的统制要领》,共同社,2023 年 4 月 28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4/aa2aef7cda40.html> [2023-4-28]。

将削弱两国原本脆弱的安全合作互信基础，进而增加两国海上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使中日政治互信进一步受到打击，两国通过非传统安全领域等途径加强安全合作的空间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日本在承担中导战力的自卫队部署方面已经逐步形成体系，对华平衡态势凸显。主要包括：（1）2022年在九州“健军”基地新编的一支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部队将于2023年迁移至石垣岛，意味着石垣岛是将来“12式陆基反舰导弹”改良型中导的一个部署营地；（2）2020年宫古岛新编驻扎的陆上自卫队第302地对舰导弹中队，未来也将承担国产陆基反舰导弹的列装；（3）2019年在奄美大岛新编驻扎的陆上自卫队地对舰诱导导弹部队，未来将承担列装日本国产反导系统；（4）可携带JSM的F35A战斗机目前有27架，未来会增加到40架；（5）现有8艘“宙斯盾”驱逐舰（4艘“金刚”级、2艘“爱宕”级和2艘“摩耶”级），未来将列装美制“战斧”以及国产改良的反舰导弹，还将在2028年之前再造2艘“宙斯盾”舰；（6）现有22艘潜水艇，在改造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后，将为列装潜射型中导做好准备。<sup>①</sup>以上能够最早形成战力（2026年之前）的是F35A的JSM、“宙斯盾”驱逐舰的美制“战斧”，以及奄美大岛的国产地对舰反导系统，射程覆盖第一岛链周边。

### （三）加大扩张性海洋军事战略的外溢效应，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

日本的上述扩张倾向将产生消极的外溢效应，在亚太地区产生恶劣影响，冲击地区安全格局，刺激地区军备竞赛，进而反作用于脆弱的中日安全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影响中日政治和经贸关系的稳定性。

从截至2023年初日本的防区外导弹配备现状来看，日方的扩张性战略方向较难有回调可能。这些部署大致如下：（1）2022年3月起已经列装了短程（500—1000公里）防区外导弹，即日本进口的列装在F35A战斗机上的JSM联合打击导弹作为基本配备，JSM的射程约为550公里左右；（2）2022年进行试验的国产地对舰诱导导弹，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日本国产“战斧”，射程大约2000公里；（3）通过2020年12月的内阁决议加速推进“12式地对舰导弹”长射程技术的研发进度。所以，目前除了JSM，下一步最早列装的是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其次应该是川崎重工研发的国产地对舰诱导导弹。<sup>②</sup>

日本发展中导战力会给周边国家带来强化军备竞赛的恶劣示范效应，给周边安全带来持续破坏性影响。自主研发和进口中导等将会刺激日本国防军工产业重新恢复“造血机制”，在国家扶持下实现良性循环，增大对外输出进攻性武器的同时，更使其自主防卫有了源源不断的军备来源。而日本发展并出口进攻性武器，如同打开战争的“潘多拉盒子”，刺激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

<sup>①</sup> 根据以下日方官方公开资料整理而成：「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2023-04-19]、『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

<sup>②</sup> 同上。



唤醒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基因，加大周边生战生乱的风险。

## 五、结语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调整，将启发人们对日本的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进行更多历史性思考。实际上，战后 70 多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始终存在追求“大国化”的基因，日本崇尚武力或实力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制造“中国威胁论”或所谓对冲中国军力仅是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手段，包括发展进攻性军力在内的军事政策改革的最终目标依然是军事大国化。

战后日本军事战略不断累积的进攻性倾向存在历史基因，它与近代日本推行军事扩张道路的战略思维和文化密切相关。那么，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日本进一步远离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呢？这是需要学界继续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收稿日期：2023-02-27，责任编辑：周文星）